

## 【论 文】

# 一九四二：蒋介石炮制“国族-宗族”论的政治动机

——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思想与民国时期的民族政治（二）

熊芳亮

蒋介石之所以炮制“国族-宗族”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其原本所坚持的“放任”、“分治”的民族主义路线，在抗日战争期间已经成为众矢之的、臭名昭彰。

1927年，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先后叛变革命，窃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并于1928年12月实现了中华民国形式上的统一，但国民党内部在如何认识、理解和继承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思想遗产，尤其是如何对待“国民党一大宣言”所主张的“民族主义”路线问题上，依然存在严重的政治分歧。“西山会议派”极力否定国民党一大宣言的“民族自决”主张，称“如是自决，则满族自决，而东三省亡于日；藏族自决，而西藏亡于英”，强调要坚持“孙先生手著之国民政府建国大纲”所规定的民族主义，而非国民党一大宣言所规定的民族主义，主张在“汉、满、蒙、回、藏人民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国族融合”<sup>1</sup>。而蒋介石的御用理论家戴季陶，则主张继续实行国民党一大宣言所主张的“民族自决”，允许蒙藏“独立”。戴季陶将中国的民族问题划分为“小问题”和“大问题”两个部分。所谓“小问题”，是指“苗，瑶，罗罗”等“散在国内的很小数的民族”而言，戴季陶主张“完全以政治力在平等的条件上面统治他们感化他们”，也就是“厉行同化”。所谓“大问题”，是指蒙古，西藏问题，戴季陶主张“以尊重独立为原则，以平等的自由的联合为原则”<sup>2</sup>，提出“要承认蒙古独立”，“要尊重滇（西）藏的独立，尊重西藏的自由”<sup>3</sup>，完全置孙中山所宣示和追求的“国家统一”、“民族统一”、“行政统一”于不顾。

作为国民党政权的“领袖”和最高决策者，蒋介石在抗战之前虽不敢公然宣扬“分裂”、“分治”，但其在民族问题上所采取的“放任主义”态度，足以证明其深受戴季陶的影响。1934年，蒋介石在南昌就外交、边疆问题发表演讲，其时东北沦入敌手，华北岌岌可危，内蒙眼见不保，蒋介石竟然出奇的淡定，不仅将国土沦丧的政治责任推卸给“实力不济”，将“边疆离析”轻描淡写地称为“体面”问题<sup>4</sup>，提出对“边疆问题”采取“放任”政策，并强调“在今日情势之下，虽欲不放任，事实上也只能放任”<sup>5</sup>，打着“师苏俄‘联邦自由’之意，依五族共和之精神标明‘五族联邦’之政策”的幌子，宣称“五族联邦”“乃今日应付边疆之惟一有效途径”<sup>6</sup>，幻想着“一旦国际大变发生，即可乘机奋起，统一复兴，时不在远”，试图引导国民党接受“除本部应为整个的一体以外，边疆皆可许其自治而组织五族联邦之国家”<sup>7</sup>的主张。

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放任”、“分治”的“民族主义”激起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强烈愤慨和

1986年版，第239页。

<sup>1</sup>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480—481页。

<sup>2</sup> 戴季陶：《三民主义的国家观》。《戴季陶讲演集》，上海新生书局，1928年版，第142—143页。

<sup>3</sup> 戴季陶：《三民主义的国家观》。《戴季陶讲演集》，上海新生书局，1928年版，第143—144页。

<sup>4</sup> 蒋介石：《东亚大势与中国复兴之道》（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三月五日在南昌北坛官邸讲）。秦孝仪编：《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二），（中国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第98—99页。

<sup>5</sup> 林恩显：《国父民族主义与民国以来的民族政策》，国立编译馆1994年版，第193—195页。

<sup>6</sup> 蒋介石：《中国之边疆问题》（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三月七日在南昌北坛官邸讲）。秦孝仪编：《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二），（中国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第105—109页。

<sup>7</sup> 蒋介石：《中国之边疆问题》（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三月七日在南昌北坛官邸讲）。秦孝仪编：《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二），（中国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第105—109页。



激烈反抗，面临越来越严重的政治困境。

第一个方面，来自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最终形成一整套完整的操弄中国“民族主义”思想和利用分离主义运动的理论体系和政治纲领：一是煽动、挑唆各民族之间、蒙藏政教势力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激化中国内部的民族矛盾与民族冲突；二是以支持“独立建国”为诱饵，诱因中国民族分离势力投向日本怀抱；三是打着“民族协和”的旗号操纵、控制从中国“分离”、“独立”后的伪政权；四是逐步倡导“日满蒙融合”，大肆推行奴化和同化教育，以图最终实现对“满蒙地区”和中国全境的完全吞并。

在侵占东北三省之后，日本很快便将这套理论体系和政治纲领应用到内蒙王公贵族身上，利用内蒙王公贵族推动的“高度自治运动”和蒙汉之间出现的紧张关系，先后在内蒙古东部地区扶持建立了伪“察南自治政府”<sup>1</sup>、伪“晋北自治政府”<sup>2</sup>、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sup>3</sup>，并于1939年8月将上述3个伪自治政府合并成立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继“满蒙”之后，日本以同样的伎俩，以迎合分裂势力的“独立”诉求为诱饵，以“民族主义”学说为旗号，将触角伸及中国西北回族聚居区<sup>4</sup>。蒋介石“分裂”、“放任”的“民族主义”，在日本帝国主义旨在分化中国、灭亡中国的既定战略之下，早已产生远远超出蒋介石所能操控的政治后果，直接危及到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区域和蒋介石集团统治地位的稳固。

第二个方面，来自于国民党外的舆论压力。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各民族“团结一体、共同抗日”的基本方针，提出“在目前阶段上，中国一切民族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前面都发生亡国的危险，一切民族应当在平等自愿的原则上最亲密的团结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应当彼此帮助，以加强抵抗侵略者的力量”<sup>5</sup>，对蒋介石集团投降、分裂的民族主义思想进行了深入揭露和全面批判<sup>6</sup>。社会有识之士也对蒋介石集团投降、分裂的“民族主义”路线强烈不满。1934年，顾颉刚在参与内蒙自治运动的“巡视”之后，深感国民党政府“边疆政策”的失败与无能，指责国民党“继续清季的边疆政策，中央派去的安抚大员都是大事搜刮，地方官吏也是横暴之极”<sup>7</sup>，“对于边疆确实没有根本的政策和一贯的工作，只有敷衍的空话”<sup>8</sup>，“对于边疆毫无办法，毫无信用”<sup>9</sup>。顾颉刚的指责可谓一针见血：“边疆人和帝国主义的关系，本不十分密切，但政府定要逼着他们（德王）倒过去，岂不是帮助了帝国主义的进攻”<sup>10</sup>。顾颉刚指斥戴季陶在边疆地区实行的是“愚民政策”，批评国民党试图“用汉族的文化来统一其他各族的文化”的“民族融合”政策是“削足适履”的“笨事”<sup>11</sup>。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在其《中国民族演进史》中，明

<sup>1</sup> 1937年8月27日，关东军携伪蒙军攻占张家口，张家口商会于品卿投日，组织张家口治安维持会。9月4日，在关东军操纵下，以张家口维持会为基础，成立“察南自治政府”。以张家口为“首府”，管辖察哈尔南部10个县，人口约200万。伪“察南自治政府”于1939年9月，并入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改为“察南政厅”，1943年改为伪“宣化省”。

<sup>2</sup> 1937年9月13日，日军侵占大同，10月15日成立伪“晋北自治政府”，驻大同县，统辖雁北13县，150万人口。1939年“晋北自治政府”改为伪“晋北政厅”，隶属为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1943年又改为伪“大同省公署”，隶属伪“蒙古自治邦政府”。

<sup>3</sup> 1937年10月27日，内蒙古王公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在日本特务机关策划下，在归绥市召开“第二次蒙古大会”，宣布蒙古“自治”，成立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

<sup>4</sup> 有关日本操弄中国民族问题进行侵华战争的历史，笔者还将另外专文论述。

<sup>5</sup> 《中央关于内蒙工作的指示信》（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四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1989年版，第71页。

<sup>6</sup> 笔者将另文专述。

<sup>7</sup> 顾颉刚：《我的事业苦闷》（1948年1月22日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演讲稿）。载顾颉刚：《宝树园文存》（卷六），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54页。

<sup>8</sup> 顾颉刚：《顾颉刚自传》（1950年）。载顾颉刚：《宝树园文存》（卷六），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65页。

<sup>9</sup> 顾颉刚：《顾颉刚自传》（1950年）。载顾颉刚：《宝树园文存》（卷六），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65页。

<sup>10</sup> 顾颉刚：《顾颉刚自传》（1950年）。载顾颉刚：《宝树园文存》（卷六），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65页。

<sup>11</sup> 顾颉刚：《如何可使中华民族团结起来——在伊斯兰学会的讲演词》（1937年11月10—14日甘肃《民国日报》）。载顾颉刚：《宝树园文存》（卷六），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61页。



确表示“民族是民族，国族是国族，这两者是不容混淆的”，强调“现今世界上，决没有真正单纯的民族国家”，“中国自然也是如此”，“为要求各族亲近、团结起见，将已往的冲突，和现在未能一致之处，隐讳而不能尽言，未免是无谓的自欺<sup>1</sup>。在蒋介石集团的专制统治之下，发表这样的言论不仅需要学识，更需要勇气。1939年，顾颉刚发表了题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著名文章，引起学界和舆论的广泛关注和讨论。虽然学者的观点不一，但是在维护国家统一、民族统一、主权统一的根本性问题上，却有广泛的共识。

第三个方面，在上述背景之下，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与权力斗争更趋激化。在“放任主义”的指导思想的之下，蒋介石一在“九一八事变”中采取“不抵抗”政策，“放任”日本帝国主义占据了东北三省；二在“东陵劫案”中徇私枉法并拒绝与清皇室谈判，“放任”末代皇帝溥仪投靠日本当上了“伪满洲国”的“皇帝”<sup>2</sup>；三在内蒙地区强行推行省治激化内蒙自治运动而后敷衍塞责，“放任”内蒙王公投靠日本建立“伪蒙政权”；四在北京接受日本所谓的“非军事化”的无理要求，“放任”“华北自治”……蒋介石甚至公然指责内蒙王公抵制南京国民政府以“商租权”与日本交换东北主权的“条件”，指责张学良抵制其放弃“北满”地区“默许”苏联势力“南进”以挑起日苏对抗的“妙计”<sup>3</sup>。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就这样在蒋介石集团步步退让、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之下陷入生死存亡的危难境地。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先分裂再收复”的投降、分裂的民族主义路线激起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强烈愤慨和激烈反抗。1935年，傅斯年提出了“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口号，强调“中华民族是整个”“是历史的事实，更是现在的事实”，反对蒋介石在日本帝国主义所操弄的“华北自治运动”中所采取的“裂土自保”的绥靖政策<sup>4</sup>。张学良和杨虎城甚至不惜发动“西安事变”以军事手段逼迫蒋介石采取抗日立场。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自觉意识空前增强，在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抗战的大背景之下，国民党内部主张“国家统一”的“融合论”逐渐占据了上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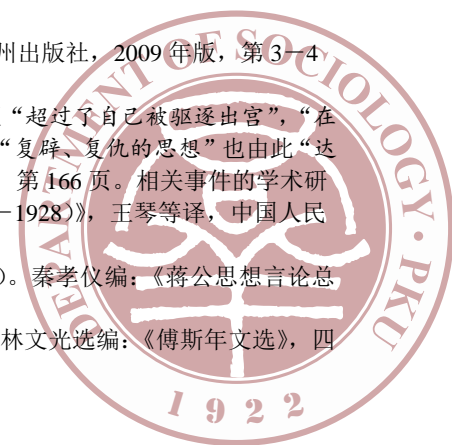
在此背景之下，调整原有的“民族主义”中的“分治”、“分裂”主张，已经成为蒋介石维护其“抗战领袖”的政治形象、巩固其独裁专制统治的迫切需要。

<sup>1</sup> 吕思勉：《中国民族演进史·序》（1934）。载吕思勉：《中华民族源流史》，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

<sup>2</sup>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曾坦言东陵劫案对其“宗族感情的伤害”甚至“超过了自己被驱逐出宫”，“在宗室和遗老间引起的激愤也是普遍而高昂的”，蒋介石随后的徇私枉法更使他“复辟、复仇的思想”也由此“达到了一个新的顶峰”。溥仪：《我的前半生》（全本），群众出版社，2007年版，第166页。相关事件的学术研究还可参看[美]路康乐著：《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王琴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26—329页。

<sup>3</sup> 蒋介石：《中国之边疆问题》（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三月七日在南昌北坛官邸讲）。秦孝仪编：《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二），（中国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第105—109页。

<sup>4</sup> 傅斯年：《中华民族是整个的》，《独立评论》第181号，1935年12月15日。林文光选编：《傅斯年文选》，四川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



## 【论 文】

同一个观点，竟被认为对国共两党的民族理论政策都产生过重大影响。其间是否存在悖谬或误解之处？

# 一九四二：“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历史误会

——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思想与民国时期的民族政治（三）

熊芳亮

1939年2月，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在《益世报·边疆周刊》第9期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文章，警示“民族自决”之类的口号、“中国本部”之类的概念、中国内部的“民族”划分所带给中国的现实危害，认为“中国之内决没有五大民族和许多小民族，中国也没有分为若干种族的必要”，提出以“文化集团”来替代“民族”的划分，并呼吁“我们只有一个中华民族”，“要逐渐消除国内各种各族的界限”，“要绝对郑重使用‘民族’二字”，“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sup>1</sup>。顾颉刚的文章一时激起轩然大波，引发了一场对中国民族政治和民族理论产生深远影响的激烈争论，傅斯年<sup>2</sup>、吴文藻、白寿彝、费孝通<sup>3</sup>、翦伯赞<sup>4</sup>等诸多名家参与其中，并最终延伸为国共两党在民族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理论交锋。也正因如此，这场具有重大思想史意义的论战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长期“隐而不彰”，“不但这场争论的重要当事人事后都较少提及，甚至相关文章也基本没有收入个人文集”<sup>5</sup>。直至近年来，学界才对发生于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那场围绕“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的大讨论，进行了比较细致、周密的史料挖掘和理论分析<sup>6</sup>。这种关注一方面自然要归功于傅斯年、顾颉刚、费孝通等相关重要当事人的“全集”或“文集”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陆续公开出版，使长期淹没于世的学术文献重新公诸于世。另一方面，也有在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之后学界关于中国民族政治和民族理论进行的重新思考和“再反思”争论的因由，以古为鉴、借古喻今的意味显而易见。也正因为如此，正确、真实地认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价值和历史意义也就显得尤为必要。

有学者认为，顾颉刚、傅斯年等人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为蒋介石的“国族一宗族”论提供了理论依据。黄天华认为，“国民党在孙文‘三民主义’的基础上，借顾颉刚等‘禹贡派’的理论，提出了较为完整的国族概念”<sup>7</sup>。而马戎则推断，傅斯年“中华民族是整个的”

<sup>1</sup>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1939年2月13日，第9期。参见《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四）》，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94—106页。

<sup>2</sup> 傅斯年：《致顾颉刚》（1939年2月），载《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sup>3</sup> 费孝通：《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益世报·边疆周刊》，1939年5月1日，第19期。

<sup>4</sup> 翦伯赞：《论中华民族与民族主义——读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后》，《中苏文化》第六卷第1期，1940年4月。

<sup>5</sup> 黄天华：《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抗战前后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争》，《一九四〇年代的中国（下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sup>6</sup> 参见黄天华：《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抗战前后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争》，《一九四零年代的中国（下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周文玖：《从一个到多元一体——关于中国民族理论发展的史学史考察》，《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周文玖、张锦鹏：《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学术论辩的考察》，《民族研究》，2007年第3期。赵志研：《“中华民族是一个”？——追忆抗战初期一场关于中国是不是多民族国家的辩论》，《中国民族报》2008年12月26日，第07版。张雷：《抗战期间昆明报刊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争鸣》，《黑龙江民族丛刊》，2009年第2期。马戎：《“民族”之辩——从1939年的那场大讨论说起》（1—4），《中国民族报》，20012年11月2日、9日、16日、23日。

<sup>7</sup> 黄天华：《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抗战前后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争》。载于《一九四零年代的中国（下

